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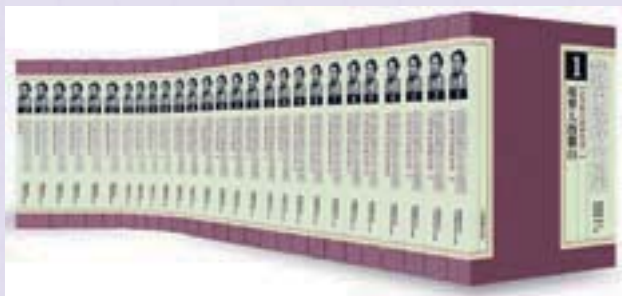
# 《戴國輝全集》別卷 在文獻學上的意義

方美芬 ◎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

2011年4月14日在國家圖書館舉行的《戴國輝全集》新書發表會，對戴家而言，是10年漫長辛苦等待的開花結果，對學術界與出版界，歷史學家戴國輝先生著作能夠完整地出版，在臺灣史、華僑史與日本的重新研究上，未來勢必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。

而自有印刷出版，全集的編輯就由來已久，但編寫旨趣卻不盡相同。《戴國輝全集》為我們提供了集中而豐富的研究資料，其中有文獻價值甚高的小傳、生平年表、日記，又注重二次文獻資料的梳理，在文獻學上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其實《全集》是在《戴國輝文集》的基礎上再深化建立的。1992年出版的《戴國輝文集》，只收錄了戴先生的中文著作。然而戴先生旅日41載，著述立說以日文居多。《全集》27冊，歷時2年4個月，動員近百位學者專家及工作人員參與翻譯、審校和編輯工作。這次戴先生所有日文著述首次全部中譯，幾占有所有著作的三分之二，除了戴夫人林彩美女士親譯親校外，並且聘請了于乃明、吳文星、林水福、邱振瑞、張隆志、湯廷池、徐興慶7位專家學者擔任日文審校群，這在臺灣《全集》編輯史上，是一件大不易的文化工程。此次《全集》的出版，對研究戴先生學術思想與治學方法，留下了完整的歷史證言。



· 《戴國輝全集》（圖片提供 / 文訊雜誌社）

而戴先生的治學脈絡，從其「梅苑書庫」的收藏，就已反映其研究的多樣與專精。這批珍藏已於2005年4月15日正式入藏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，並以「戴國輝文庫」集中管理，因為中研院深知「戴國輝先生不是一般的藏書家，而是研究型藏書家，故絕大多數的典藏都含有直接之學術價值。」

（註1）因為若將收藏者的研究文獻分割典藏，勢必失去對戴先生學術思想軌跡的完整尋繹。

全集的出版，除了能夠一探戴先生的治學理念，更重要的是留給後來研究者接續更進一層的研究，因此該次參與整理和編輯文獻上，編輯群都達到一定的學術水平，所以能夠完整呈現戴先生的治學全貌。因此全集依內容性質編排，分成了史學與臺灣研究、華僑與經濟、日本與

亞洲、人物與歷史、文化與生活、書評與書序，以及採訪與對談七個領域項目。另外，爲了與全集個人文章完整性作出明顯的文獻區格，特別將與戴先生有關的研究資料別爲一卷，另外編製《別卷：殖民地的孩子——歷史學家戴國輝》一冊。這種採用文獻整理方法，在臺灣全集編纂上是第二個成功的範例。（註2）

大體而言，《別卷》的編排，屬於「資料彙編」性質。所謂「資料彙編」，據張大可、俞樟華合著的《中國文獻學》一書釋義，是指「爲適應現代社會科學發展的需要或研究，把某一方面或某一專題的資料，按一定的方法進行編纂，以供閱讀或翻檢的資料性參考書。」（註3）張春輝稱它爲「邊緣性工具書」，是一種將各種專題資料「摘編」或「選編」而成的工具書。它與一般的工具書不同，「既可起索引作用，又可起原始文獻作用。由於其資料經過摘取，分類、集中排印，可省去研究人員報轉查尋之勞。」（註4）也因爲其中匯集了許多「二次文獻」資料，具有「閱讀」與「翻檢」特性，研究者更可據此作爲研究基礎。

由於資料彙編，是對原始文獻的重新排列，除了能夠提供資料出處，又可循線檢索到全文，故又有「檢索兼參考性工具書」之稱。因爲有此特性，出版時編輯者給予的名稱也並不一致，有資料彙編、資料卷、文獻集、別卷等名。比如直接以「資料彙編」名之的，有《李喬短篇小說全集》、《詹冰詩全集》；或名爲「資料卷」，如《張秀亞全集》、《楊逵全集》、《葉石濤全集》、《錦連全集》；另外也有稱爲「文獻集」，如《龍瑛宗全集》、《張文環全集》；而《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》的《別卷：鄭清文和他的文學》，則以《別卷》名之。雖然名稱各異，內容大抵是收錄作者照片、寫作年表，以及他人憶述作品和評介文章。然而這些資料彙編，嚴格來說，其實都未能達到「書後索引」的標準。

文獻學家張錦郎先生認爲過去只有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的書後索引編的最好，第54冊《總目》，除附有各冊總序原文外，並將53冊的總序目、目次、全集篇目和章節，按筆畫、四角號碼、注音符號、漢語拼音順序彙編成書後索引，得以俾見全集梗概。原本《柏楊全集》也曾構思將其著作目錄及評述資料編成《柏楊研究資料》，擬以附冊形式出版，惜尚未完成。如今《戴國輝全集·別卷》的出版，應可作爲編輯書後索引範例，這在文獻學上有著特殊意涵。

無論古今，「文獻整理」是文獻學的基本要務，而「整理結集」後出版，才能將著述者的思想言論記錄傳佈。傳統文獻學發展到了清朝已臻至極境，至近代受西方思潮影響，因著新興出版社和圖書館的創建，以及文獻新載體、新材料的出現，適應新思維和新時代的文獻工作概念也就應運而生，因而有了現代文獻學的生發。現代文獻學在傳統文獻學基礎上，繼承舊有的特點再創新適用，呈現了嶄新的兼容面貌。

細察戴國輝全集《別卷》的內容架構，共分爲圖片集、生平年表及日記、生平資料目錄、全集總目、評論選文與篇目索引六部分，乃是融合了傳統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概念，從《別卷》編輯上，可以看出這種繼承與創新的脈絡。以下就《別卷》內容架構，分析其在文獻學上的交融情形。



## 1. 圖片集

傳播媒體的蓬勃發展，顯示出視覺藝術的重要性。影像是文字之外傳遞認識客觀世界的具體方法，影像代表著另一種語言，從影像所透露的訊息，我們看到了時代社會的生命故事。輯一圖片集慎選了日常照片173張、文物13張、梅苑書庫珍藏文獻6張，共有192張與戴先生學術生活、珍藏文物相關的代表性圖片。這些影像實錄，印記了戴先生學術研究上親經親歷的踏實態度，那種情感與理智、心靈與智慧的和諧追求，折射出戴先生的生命哲學。

## 2. 生年年表及日記

學術研究是以文獻整理作為基石，藉由日記的閱讀，最能直接探索戴先生的真實生命，因為「日記所折射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生活世界，而是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。」（註5）輯二生年年表及日記包含了小傳、生年年表與日記三部分，由戴夫人林彩美女士從1961至2000年的記事本中編譯而成，並核對查實戴先生相關著述與文物，在人物、時間、事件中作了密切結合與繫聯，雖然只是資料性的簡短記述，卻是研究戴先生學術生命的基礎輪軸。

## 3. 生平資料目錄

該輯主要是集結戴先生和各方的文章與記錄資料，其下又細分自述、他述、採訪與對談（座談）四類，採訪與對談之下再分專書、單篇、年表、其他四小類。各類均依時間先後排序，可以具體直探戴先生學術思想的嬗變軌跡。

## 4. 全集總目

輯四「全集總目」下，分總目錄、專書目錄及提要、未結集與未發表著述篇目三個子項目，這部分蘊含著傳統文獻學的優良內涵。

總目即書目的意思，人類圖書，浩如煙海，如何找到適切圖書，則有賴目錄來指引。清代學者王鳴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說：「凡讀書最初要者，目錄之學。明目錄，方可讀書；不明，總是亂讀。」《全集》依類將戴先生已出版之著作分成七大類，讀者只要按類搜尋27冊之目次內容，自可按圖索驥找到想要閱讀的篇章。

專書目錄及提要，則簡要介紹了戴先生22種中日文專書，並附書影。提要是對文獻論著的內容說明，簡扼介紹作者生平、學術思想和揭示文獻內涵的一種方法，在中國目錄學發展史上有其優良傳統，它是書目的靈魂，幫助讀者認識和利用圖書的導引。提要西漢稱為「敘錄」，北宋稱「解題」，現代人或作「題解」。其編寫體例，大體分作敘錄體、注錄體、傳錄體與輯錄體四種類型。而專書目錄及提要，主要側重在專書目次內容和版本的介紹上，承繼了劉向父子敘錄精神。

在專書出版之外，戴先生尚有未結集的單篇文章和一些遺稿未及整理與發表，這部分整理工作，相當於傳統輯佚學，計收有日文238篇，中文73篇，依文章發表或寫作年代排序，將之歸於「未結集與未發表著述篇目」中。這些篇章，發抒了他對臺灣農業與經濟、中國社會史、臺

日問題、日本與亞洲、東南亞華僑、殖民地等多元議題的論述。而為了方便查找資料，特別於輯六編製了「未結集與未發表著述篇目索引」，讓我們深切感到戴先生還有許多未竟的系統研究工作尚待完成。

## 5. 評論選文

在現代文獻學觀念裏，書評是文獻導讀的重要指引，是幫助讀者了解一本書的入門磚。書評一般可以分成三大類：一是出版商宣傳和促銷新書的宣傳文字；二是向普通讀者引介暢銷書或指導如何閱讀書籍；三是報導和評價學術專著的書評。其中專家學者的書評，是揭示並探索著述者研究歷程與思想精髓的重要論述。輯五的評論選文，主要選錄了《與日本人的對話》、《日本人與亞洲》、《境界人的獨白》、《新亞洲的構圖》、《臺灣與臺灣人》、《臺灣往何處去？！》、《討論日本之中的亞洲》7本18篇評論戴先生對臺灣和日本研究的專書。評論者如加藤祐三、鶴見良行、須田禎一等人，多為臺灣史與日本史研究者，由此，更能見出戴先生於臺灣與日本議題研究上，在日本深受肯定的價值與地位。（註6）

## 6. 篇目索引

輯四「全集總目」下的「總目錄」與「專書目錄及提要」部分，將戴先生已出版的圖書內容作了說明，而最重要的「未結集及未發表著述篇目」，是戴先生尚未結集的重要文章，將之另外編就索引，按筆畫順序排列，更方便查找閱讀。除此之外，我們也期待戴先生尚有一些散佚的文稿仍有重回的一日，也許未來或有機會將輯佚的文章再別為一冊出版。

總體來看，《別卷》最大特色是包含了大量的「二次文獻」，如「生平資料目錄」、「全集總目」與「未結集與未發表著述篇目索引」，占了全書三分之一多。二次文獻也稱「二級文獻」，它是將大量分散無序的一次文獻進行整理分析，並按照文獻學理論進行邏輯順序和科學體系的編排存儲，系統化後，可以便於檢索利用，比如目錄、索引、文摘等。由於二次文獻具有明顯的彙集性、系統性和可檢索性，能幫助研究者節省查找一次文獻的時間，自20世紀以來，是現代文獻學發展上的重要項目；再配合資訊科技的精進，由紙本目錄、索引、文摘所研發的資料庫，幾乎是二次文獻的產品。《別卷》既有著「資料彙編」性質，除了保有傳統參考性工具書特性，又兼具現代文獻學的檢索功能，在文獻學上可謂交融了繼承與創新的精神。

由於一般編全集者，很少願意投注人力和時間來編製書後索引，研究者大多只能憑藉記憶來翻檢資料。然而索引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利器，它能夠在短時間內查檢翻閱資料的正確位置。《戴國輝全集》的《別卷》，不僅記錄了戴先生生平及其學術活動，而研究資料的完備輯編，更系統地反映出戴先生學術生命與學術研究全貌。

此次全集的出版，是戴夫人林彩美女士對先生學術研究的尊崇，是張錦郎先生辛勤奔波走訪的成果，是學界尊敬戴先生在臺灣史、華僑史與日本史研究的肯定，更是文訊團隊在全集編輯出版的更上一層樓，重要的是，它更展現了臺灣出版界的恢宏氣度。📖



## 註釋

1. 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。〈入藏緣起〉，《戴國輝梅苑書庫入藏中研院人文圖書館紀念冊》。2005年4月，頁1。
2. 第一個成功範例是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的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。
3. 張大可、俞樟華。《中國文獻學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。2005年9月，頁224。
4. 張春輝。試論邊緣工具書——我國資料匯編的產生、發展及其文獻價值。《圖書館論壇》，1991(1)。1991年2月，頁86-92。
5. 余英時。〈從《日記》看胡適的一生〉《重尋胡適歷程：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》，臺北市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04年5月，頁1。
6. 除了輯五的評論選文，《全集》各書中也附錄了一些評論文章。

